

海外新移民与新农村建设

——兼论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化

孟庆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出国务工而兴起的海外新移民潮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迅速蔓延,并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一种新模式。尽管基于地域条件所限,这种新农村建设路径模式并不能在其他区域简单模仿或复制,但其仍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化理解及其发展思路设计具有若干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 海外新移民;新农村;建设模式;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3)05-0040-04 **收稿日期:** 2013-03-22

基金项目: 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项目“海外新移民与当代东南沿海农村社会变迁”(B-8101-10-0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孟庆梓,男,河北邢台人,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期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战略部署。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随后,全国广泛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各地政府纷纷结合本地特点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并取得明显成效。其中,集中反映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新移民侨乡新农村建设实践亦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一种新模式。考察与解读该模式实践内涵对于我们进一步透视当代海外新移民现象以及当代新农村建设路径之讨论均有显著现实意义。

一、东南沿海农村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

“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近3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当代中国海外移民潮也迅速兴起。据有关学者的估算,1978年至2003年,中国大陆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约在250万至280万之间,其中来自农村地区尤其是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侨乡的出国新移民

群体占据了较大规模,2004年估测显示仅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数已高达90余万,广东省海外新移民人数也有60余万。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国动机主要发端于经济原因。一般而言,在农村海外新移民迁出地分布较广的东南沿海地带,由于当地村落发展大都存在土地贫瘠且地少人多的传统自然条件限制,因而如何进一步转移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突显。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需求则日益扩大,国际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由此,借助于华南传统侨乡丰富海外华侨华人关系网络资源的东南沿海村落最终走上了出国务工求发展的跨境移民历程。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当代东南沿海侨乡的新移民潮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作的跨境劳务输出,从长远看,是中国自身极其丰富却又无法充分消化的人力资源伴随全球化进程而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大市场需求的必然过程”。

从迁入地分布区域来看,这些新移民的流向范围跨越世界各大洲,显现出“全球化”态势,尤其是较为集中流向发达国家地区。就身份特征与迁移方式而言,与往往凭借资金、教育、科技等优势而产生的投资移民、留学移民、技术移民等城市“精英移民”类型不同,东南沿海农村海外新移民则主要集中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体,大都属于正常或非正常劳

工型移民、家庭团聚型移民等类型。在年龄构成上,他们较多属于青壮年劳动力。目前,这些农村海外新移民在国外的职业构成主要集中在餐饮、制衣、销售、贸易、建筑等多种行业,近年来其中还不乏出现了若干由务工向经商成功转型且日渐发达的范例。总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大背景下,当代东南沿海侨乡出国新移民潮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特征及移民网络,并对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全面建设要求之实现产生巨大影响。

二、海外新移民与新农村建设关系解析

(一)海外新移民与农民生活质量改善

作为不断吸引一波又一波农村移民群体纷纷出国务工的直接引力,在发达国家打工获得的高额劳动报酬为新移民村落带来的最大收获便是促使当地农民收入迅速增多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善。

据2005年笔者在福建沿海新移民村落的实地调查资料显示,本世纪初当地出国新移民在国外打工的收入状况大概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在美国,一般月收入约2万元人民币;第二层次是在英、法、意等欧盟国家,一般月收入约1万元人民币;第三个层次是在新加坡,一般月收入约7千元人民币。依此推算,三个层次下每位务工海外新移民每年的国外总收入分别为人民币24万元、12万元和8.4万元,平均为14.8万元。考虑到这些农村出国人员在国外的生活比较节俭,以及按照当地村民的普遍说法:“全村(国外)打工的70%~80%的钱都会寄回来”,那么每人每年汇回国内家中的款额平均达到7.8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估算是可信的。并且,由于一个家庭中还不止一人出国,所以几年下来,当地一个出国新移民家庭经济总收入便可高达数十万元。用当地村民自己的话说,“我们早就小康了”。迅速增多的经济收入为当地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促成了其家庭生活模式由“温饱型”向“舒适型”的根本性转变,“吃、住、用、穿”的消费结构迅速被“住、用、吃、穿”所取代。尤其是在住宅建设方面,东南沿海的新移民之村随处可见一栋栋三、四层的“别墅”,楼内宽敞明亮,房间众多,装修豪华,这些颇具欧洲式样的小楼建筑费用往往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显示出当地新移民家庭生活经济基础的雄厚。

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家庭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精神生活上。由于新移民家庭收

入的巨增,也使原来整日忙于农业劳作的农民迅速从生活压力的重负中解放出来。于是,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强烈,以休闲娱乐为中心的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被更多的当地村民所接受和喜爱,甚至不少老人在出国子女鼓励下已经先后到过国内外多个著名旅游景点观光消费。

(二)海外新移民与农村生产发展

新移民家庭经济收入的迅速增多也直接促成当地村落侨汇存款规模日益庞大,从而汇聚成一股巨额民间资金,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90年代后期以来,基于祖籍认同和乡情纽带的内在维系,业已在海外打拼发达的海外新移民纷纷回乡投资兴办乡镇企业,从而有力推进了原籍地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农业生产发展来看,出国务工潮的迅猛发展为当地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新的有效渠道,当地“地少人多”的传统生存发展矛盾亦得到缓解,集约化经营可耕地、山林、海滩等农业资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日渐增强。与此同时,大量的侨汇资金投入也大大加强了当地各种农业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有效地改善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使原有农业经营产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其次,从非农经济发展来看,新移民的投资创业大大推动了当地农村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调查资料显示,目前东南沿海地区海外新移民回乡投资创业的行业颇为广泛,涵盖了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并充分运用自身熟悉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的生活经验积极参与进出口贸易,获得显著经济效益,带动了当地及周边乡镇的农村经济发展。例如,在海外新移民输出地集中的浙南温州地区,截至2008年,当地共引进三资企业2593家,总投资125亿美元,其中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企业数、投资额均占80%以上。而在当地瑞安市塘下镇,全镇侨属企业38家,全年总产值达17.81亿元,占全镇总产值的7.2%,创利税达5.922亿元,占全镇总利税的3.2%。这种情况不仅推动着当地农村产村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也为当地周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量国外侨汇回流以及新移民的回乡探亲和投资,又刺激了当地的消费,扩大了内需,助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代出国移民潮的兴

起也对当地农村生产发展带来一定挑战。一方面,受国外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较多的就业机会和高额劳动报酬吸引,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出国务工求发展,这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存在着青壮年劳动力过渡流失的潜在风险,从而可能给当地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冲击。另一方面,虽然大规模的海外新移民群体带回了巨额的外汇资金,但是基于投资兴业经验不足等诸多原因的限制,其中仍有大量资金滞留银行或部分流失于带有一定攀比性的高档住宅建设消费之中,因而亟待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和统筹规划。

(三)海外新移民与乡风文明建设

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和发展,还引领着当地乡村文化建设朝着日渐开放、上进与文明的总体方向演进。持续的外汇收入使当地村民家庭生活更加宽裕,而宽裕的经济条件又促使其追求更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而新移民在国外生存发展的工作生活经验也引发着当地乡村社会风气、观念的更新,并反映在多个生活侧面。

例如,在生存发展观念上,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大大激发了当地农民的求富意识和竞争意识,许多农民生存观念早已不再是固守农耕、只思温饱的小农意识状态,而是引出诸如“他们在外国能行,为什么我不行?”、“别人出去都富了,自己也要出去”的自我心理激励,迅速树立起以“走出去、多赚钱、快致富”为导向的上进方向;又如,在婚恋观上,由于许多青年新移民大都长期务工于国外,无法再接受原有的“相亲”习俗,而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接触来选择自己的终生伴侣,并逐渐被父母所认可。正如一位村民所言:“出不了国的在家乡自己找,出国的让他在外自己找”,由此可见,在新移民影响下,当地已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自由恋爱潮迅速涌起;再如,在新移民潮发展过程中,由于留守妇女往往承担了照看老人、孩子以及家中琐事的责任,并且有些新移民的成功者本身就是女性,因而促使当地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既反映出时代的进步,也反映出新移民之乡妇女传统社会角色的逐渐改变。当然,新移民引发乡风观念的最大变化还反映在当地捐献行为的日益盛行。许多调查研究结果均显示,无论是在福建、广东还是浙江的海外新移民村落,对当地公益事业的踊跃捐献早已经蔚成风气:从修路、建桥、安(路)灯到捐资助教,扶贫帮困,以及筹建“老人

会”、腰鼓队、戏剧团、文艺队等不一而足,这些公益捐献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万元。

概言之,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有力推进了当地农村文明价值观的构建步伐,体现出农民由传统“保守型”价值观向现代“进取型”价值观的潜在转变。不过,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代出国移民潮兴起过程中,某些具有一定传统性的炫耀意识、攀比意识也在当地村落中愈发彰显,尤其是当地新移民往往将数十万元的大笔资金投入很少甚至无人居住的豪华装修别墅型住宅建设中,显示出一定的浪费与消费的非合理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引导和调整的。

(四)海外新移民与村容环境美化

在东南沿海省份一带,走进过新移民之乡的每个人都会对当地村落整洁有序、洋楼错落、绿树成荫的村容村貌留下深刻印象。而其之所以形成如此靓丽的乡村环境则与新移民的大力支持和捐献直接相关。出国在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打拼多年的工作生活经验,不仅使这些自农村而来的新移民通过劳动和经营得以发家致富,而且还使他们的生活观念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渐发生巨大改变。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卫生环境、别墅住宅、宽敞街道、休闲公园等高质量人居环境不仅令其大开眼界,还令其逐渐产生适应感和追求感,并将这种内心想法和愿望付诸于关爱家乡和改变家乡人居环境的建设实践中。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先后参照欧美发达国家别墅修建起自己家乡中一栋栋风格各异、色彩多样的小洋楼,内有卫生洗浴器具齐全的精美装修,外有瓷砖琉璃映衬,一派豪华气象。另一方面,他们每次不远万里回到家乡捐献时,还总会非常关注修路、建桥、安(路)灯、设置垃圾筒以及修建小公园的建设进展。总之,在当地村委会的统筹规划以及新移民大量侨汇资金的支持下,数十年以来,东南沿海各地新移民之乡正日益呈现出一幅幅环境优美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农村新画面。

(五)海外新移民与基层民主管理

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其在农村建设实践中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制度和机制主要是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村务公开制度、管理民主的监督机制、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组织。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与发展,当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机制建设实践也出现了若干新情况和

新变化,显示出诸多“与众不同”的新优势:一是新移民的海外工作生活经验使其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亦激发了他们更多关注、参与家乡基层民主管理的热情与积极性,甚至有一些出国务工人员回乡后直接到村委会竞聘上岗任职;二是新移民的大量侨汇和捐献在支援家乡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还促进了当地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在当地,村委会对于每年每季度村内各项收支情况,尤其是涉及新移民捐建的项目财务使用情况均有详细公示或直接向年终回乡探亲的新移民代表说明;三是新移民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地位令其在监督村内民主建设方面作用日益凸显,进而推进村委会在实现基层管理过程中调查民意、尊重民意、采纳民意的民主化意识逐渐强化。笔者实地调查中发现,尽管新移民本人往往长期滞留国外工作生活,然而每当遇有选举或村落重大事务讨论时,当地村委会一定会亲自或嘱托其家属电话告知远在他国的新移民本人知晓,征求并考虑其建议;四是由于新移民长期身处异国他乡而造成原乡留守家人缺乏照料,因而潜移默化中村委会经常走访、关照村民的工作内容日渐增多,从而也助推着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方向转型。

三、总结与讨论:新农村建设的多样化模式思考

上述内容表明,东南沿海农村出国新移民潮的兴起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尽管基于当地经济、历史、文化、地理等条件所限,这种新农村建设路径模式并不能在其他区域简单模仿或复制,但仍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化理解及发展思路设计具有如下的启示性意义。

其一,新农村建设统一目标下的发展模式多样化。由于“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进而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新农村建设模式,本质上也就是农村发展模式,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有关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实践考察和讨论颇为热烈,工业型新农村、特产型新农村、旅游型新农村、郊区型新农村、边贸型新农村、沿海型新农村、山区型新农村、牧区型新农村、生态型新农村等,不一而足。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各地农村基础条件差异的客观存在,因而必然导致全国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我们不可能强求所有地区都整齐划一,采用同一种路径、同一种模式,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

推进新农村建设。本文所述当代东南沿海出国移民潮兴起下的新农村发展实践亦进一步反映出这种建设思路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其二,全球化、市场化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化。当代东南沿海出国新移民潮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的时代产物。而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及其对东南沿海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外新移民之乡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自然选择亦与当代全球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事实上,进一步从更广阔的范畴来看,我国新农村建设显然不仅发生于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还要在其作用下寻求适应与发展。换言之,“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农村发展滞后的中国现实背景和乡村建设相关知识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发展战略”。避免机械模仿,坚持多样化的路径和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发展战略下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其三,“以人为本”、“科学引导”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化。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与发展之所以能够激发东南沿海农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其根本动力源于跨出国门的农民群体职业技能提升、财富与创业经验积累以及生存价值观念更新所带来的诸多有力推动。从新农村建设角度看,这正凸显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由此可见,要最终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依靠农民、发展农民、惠泽农民,并通过农民的集体劳动推进新农村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另一方面,现实也表明,当代东南沿海一带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在推动当地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中部分地区还较为突出地存在着诸如青壮年劳动力过渡流出、巨额民间资金闲置或流失以及攀比性非合理性消费等问题,亟待当地政府等有关部门通过科学引导加以解决或改善。这种情况表明,在全国多样化新农村建设模式实践过程中,尽管各地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引导”却始终有必要成为解决或改善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对策思考出发点。✽

参考文献:

(下转 50 页)

- [11]陈良文, 杨开忠, 吴斌. 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实证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1): 81-88.
- [12]刘乃全, 刘学华, 赵面岗. 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 1985—2008[J]. 山东经济, 2011(2): 5-14.
- [13]Fan, C. C.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pansions of Chinas City System [J]. Urban Geography, 1999, 20(6): 493-515.
- [14]Song, S. and K. H. Zhang. Urbanization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 [J]. Urban Studies, 2002, 39(12): 2317-2327.
- [15]Chen, Z. and Fu, S. Dynamics of City Growth: Random or Deterministic? Evidence From China[C]. Proceedings of CES2006,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6.
- [16]Anderson, G. and Y. Ge.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5, 35(6): 756-776.
- [17]Chung, J. and T. Lam. China's 'City System' in Flux: Explaining Post-Mao Administrative Changes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80(12): 945-964.
- [18]Au, C. C. and J. V. Henderson. "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0(2): 350-388.
- [19]陆铭, 向宽虎, 陈剑.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调整: 基于文献的评述[J]. 世界经济, 2010(6): 3-25.
- [20]Marshall, A.,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 [21]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 [M]. New York: Vintage, 1969.
- [22]Fujita, M., Krugman P. R. and A. J.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 [23]Redding, S. and A.J. Venable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2(1): 53-82.
- [24]Hering, L. and S. Poncet, "Market Access and Individual Wage: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 145-159.
- [25]章元, 刘修岩. 集聚经济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2008(3): 60-70
- [26]范剑勇. 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J]. 经济研究, 2006(11): 72-81
- [27]Glaser, E. L., Scheinkman, J.A. and A. Shleifer.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R]. NBER Working Paper, 1995, No.5013.
- [28]陆铭, 陈剑.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J]. 经济研究, 2004(6): 50-58.

Labor Migration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Cities of Pearl River Delta of China

YU Ji-xiang^{1,2}, ZHOU Guang-xia¹, YAN Fu-xiong¹

(1.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Anhui, 233100; 2.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 Using census data to get residential population of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of China, with Zipf Index to measure concentration ra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we find that labor migration in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ratio. Furthermore, we test the cities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bility with city size and other economic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ity size is the only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ability significantly. With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it is helpful to make use of ability of large citys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for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City Size Distribu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y

(上接 43 页)

- [1]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J]. 世界民族, 2006(3): 38-46.
- [2]郭玉聪.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J]. 当代亚太, 2004(9): 57-61.
- [3]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 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2): 38-49.
- [4]潮龙起. 粤闽浙三省新移民职业结构的比较研究[J]. 八桂侨刊, 2009(3): 38-43.
- [5]孟庆梓. 海外新移民与当代乡村经济变迁——以福建省福清市 J 村为个案的实证研究[J]. 南方人口, 2007(4): 39-44.
- [6]尤云弟. 温州市重点侨乡玉壶、丽岙、塘下三镇移民比较研究[J]. 八桂侨刊, 2011(2): 52-59.
- [7]刘莹. 浙南侨乡经济发展的侨务资源优势[J]. 华侨大学学报, 2009(2): 93-100.
- [8]刘莹. 浙南侨乡社会的历史变迁[A]. 钱江、纪宗安. 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C].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213-224.
- [9]孟庆梓. 海外新移民与当代农村文化变迁——基于福建沿海 J 村的调查分析[J]. 南方人口, 2008(1): 18-24.
- [10]吴珍, 周立新. 实现管理民主,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课引导之六[J]. 党建, 2006(7): 26-27.
- [11]费孝通. 从实求知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01.
- [12]陆益龙.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模式及误区——一种社会学的理解[J]. 北京大学学报, 2007(5): 131-137.

New Migrants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lso a Discuss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Model

MENG Qing-z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wave has rise quickly in China's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s, It has produced influence deeply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ose emigrational rural areas, and has become a new model of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Despite limited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is new rural development path mode and not in other regions simple imitation or copy, but its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ways to design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mode still has a number of apocalyp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ew migrants;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Mode; Diversification